



FGS

Frontiers of Global Sinology

FGS, Vol. 1, No. 1, 2026, pp.10-19.

Print ISSN: 3106-5503; Online ISSN: 3106-5511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fg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fgs260102islta>



学者素养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西班牙汉学家高伯译的中国古典文学翻译研究

李翠蓉 (Li Cuirong)

摘要: 近年来, 中国古典文学在西班牙语国家的翻译与传播也逐渐得到学界关注, 对相关的汉学家译者也展开了专门研究, 就其学者素养对翻译活动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对象选择、“厚译”策略两点; 较少有研究系统地讨论汉学家的学者素养及其对翻译活动各个层面产生的影响。本文以高伯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活动为研究对象, 从他所作的翻译理论研究、对翻译对象展开的阐释、对中国古典文学西译本的翻译批评三个层面论述他的学者素养, 同时考察它们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以丰富译者研究的内涵, 为中国古典文学的西译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 学者素养; 高伯译; 中国古典文学

作者简介: 李翠蓉, 贵州财经大学副教授, 研究方向: 中国古典文学西译, 电邮: marialcrespana@126.com。

Title: The Influence of Scholarly Literacy on Translation Activities—A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by Spanish Sinologist Gabriel García-Noblejas Sánchez-Cendal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n Spanish-speaking countries have gradually gained the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c circles, and the related sinologists and translators have been specially studied, but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their scholastic qualities on th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mainly focuses on the selection of

translation objects and the strategy of “thick translation”; fewer studies have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the scholastic qualities of sinologist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various levels of translation activities. Fewer studies have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the scholastic qualities of sinologist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t various levels. In this paper, we take García-Noblejas’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s the object of study, and discuss his scholarly qualities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his theoretical study of translation, his interpretation of translation objects, and his criticism of the translation of western translations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examine their impact o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n order to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tudy of translator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western translations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Scholarly Literacy; Gabriel García-Noblejas Sánchez-Cendal;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utor Biography: Li Cuirong, Associate Professor,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he translation in spanish of cla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marialcrespana@126.com.

高伯译（Gabriel García-Noblejas Sánchez-Cendal, 1966-）很早便与语言、翻译结缘。1984年进入奥维耶多大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专业学习，1989年进入英国杜伦大学开始博士学位课程，在校期间担任生物系的英西笔译，始启他“以译贯之”的人生：译者、翻译理论研究者、翻译批评者、翻译学教师。

带着既有的外语习得体验与翻译经历，高伯译于1993年来到中国，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学习汉语，期间也教授英语、西班牙语。在中国的5年间，他还作为自由译者，从事汉西、英西翻译工作。1998年，高伯译翻译的《韩非子：政治艺术》（*Han Fei Zi: El arte de la política*）在西班牙问世，这是他翻译的首部中华典籍，自此，他“以译贯之”的人生驶入“一以贯之”的汉籍西译轨道，到2023年出版的《中国志怪小说》（*Cuentos fantásticos chinos*），高伯译已经翻译了近30本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但是，尚未引起学界关注，国内外也尚无学者从翻译家研究、翻译批评的角度对其展开研究。

一、翻译理论素养与翻译实践

纵览中国古典文学西班牙语翻译史，可见汉学家译者与翻译对象之间深厚的羁绊，例如，吉叶墨（Guillermo Dañino, 1929-2023）、苏亚雷斯（Anne-Hélène Suárez Girard, 1960-）之于唐诗，宫碧蓝（Pilar González España, 1960-）之于宋词，雷爱玲（Alicia Relinque Eleta, 1960-）之于元曲等，他们偶然接触到这些作品，进而产生审美认同，再去攻克语言关、翻译关，习得符号转码能力后，便集中地翻译此类对象，既为“初心”，也因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博大精深，持续耕耘、反复琢磨方能有所得。

高伯译却不同，他的翻译对象包括古典神话、先秦诸子散文、《诗经》、汉乐府、志怪小说、唐宋传奇与清代小说等，能见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挚爱，却不见他对某一类作品的偏爱。高伯译为何能“译全”中国古典文学史呢？答案就是他“以译贯之”的人生，高伯译对语言文字、翻译有着初始的、连贯的、深层的志趣，他先执着于“译”，再关注“译什么？”换言之，即使不译汉籍，高伯译大概率也会成为一名译者。

早期对翻译问题、翻译理论的关注与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高伯译曾在1988年至1992年期间，连续三次参加西班牙符号学学会国际研讨会，并发表了3篇学术论文：《翻译：一种去中心化的写作》（*La traducción, una escritura desde el descentramiento*, 1988）、《翻译、等值与文本意义》（*Traducción, equivalencia y valor textual*, 1990）与《文本翻译的文化问题》（*Problemas culturales en la traducción de textos escritos*, 1994）。

高伯译善于从跨学科视野下，借用不同的理论来阐释翻译问题，例如，在《文本翻译的文化问题》中，他将保罗·瓦兹拉威克（Paul Watzlawick, 1921-2007）对于文化的阐释、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 1927-2016）的框架理论迁移至翻译问题研究，他认为，每一个交流行为都有它的文化框架，“文本也是一种交流行为，它的沟通物质是语言，由一系列自带意义框架的文化物体构成。”（García-Noblejas, 1994, p. 167）所以，译者应该重视文化所指，“应该思考自己正在着手的文本所处的两个框架。”（García-Noblejas, 1994, p. 168）具体而言，如果在两个框架中均存在这个文化所指，但结构不同，译者就应该决定是否改变原文的结构来适应译入语的结构；如果译入语中不存在这种文化所指，译者要么不译，要么在译入语中“创作”一种，“如果决定不译，译者应该权衡译出文本中被肢解部分的功能以明确它对文本意义的影响程度。”（García-Noblejas, 1994, p. 169）

如上，高伯译的翻译研究虽然从理论出发，但并不止于理论层面，而是从理论层面落到翻译实践操作，如此一来，他对翻译理论展开的研究便能为翻译实践提供参照。高伯译在翻译《关雎》时，虽然西班牙不存在“雎鸠”，但却存在一种相似的鸟：欧斑鸠（tórtolas），有“相爱的伴侣”的义项，因此，他便决定“改变原文的结构来适应译入语的结构”，用“tórtolas”来留存原文的比喻义。

2002年，高伯译获得奥维耶多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为《中国文学西译：干宝的一篇故事》（*La traducción de la literatura del chino al español: un relato de Gan Bao*），在语用学与跨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下，通过文本分析与翻译文化指射展示西译中国经典故事的挑战。高伯译剖析译文的文本意义生成过程，他首先分析字词完全对应的西语译文，即“粗糙文本”；再解析能让译语读者理解、阅读的“精细文本”，并剖析从“粗糙文本”到“精细文本”这个过程中需要插入的变动；最后对照分析两种译本的生成过程。

基于对文言文到现代西班牙语的过程的反复研究与摩挲，高伯译从理论层面掌握了汉、西语言符号转码的一般性规律与部分翻译技巧，才让他后来的翻译实践事半功倍，他的理论素养助力了翻译实践。

获得博士学位以后，高伯译成为了格拉纳达大学的教师，主要教授汉西翻译与中国文学类课程，自此也开启了兼职译者的历程。他的翻译历程大致可以2004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此前多以“首译”

为主，主要作品有：《韩非子：政治艺术》（1998）、《山海经》（*Libro de los montes y los mares*, 2000）、《搜神记》（*Antología del Soushenji*, 2000）、《中国志怪小说》（*Cuentos fantásticos chinos*, 2000）、《博物志》（*Relación de las cosas del mundo*, 2001）、《公孙龙子》（*Libro del maestro Gongsun Long*, 2001）、《还冤志》（*Las venganzas de los espíritus*, 2002）、《窦玉妻——中国唐宋故事选》（*El letrado sin cargo y el baúl de bambú. Antología de relatos chinos de las dinastías Tang y Song*, 2003）、《中国古典神话》（*Mitología clásica china*, 2004）与《老残游记》（*Los viajes del buen doctor Can*, 2004），高伯译在短短几年贡献了 10 部译作，它们都是首次被译为西语，西班牙皇家历史学院院士路易斯·阿尔贝托·德昆卡（Luis Alberto De Cuenca, 1950-）称他这种“将中国永恒的美与智慧传递到卡斯蒂利亚语的行为是无价的。”（García-Noblejas, 2013, p. 1）

2004 年之后，高伯译进入“复译”阶段：对别的译者或者自己翻译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进行再次翻译，译本主要有《中国古代神话》《中国古代民诗》《诗经》《孙子兵法》《易经》《道德经》《庄子选》《诗经与诗意画》《道德经与神仙画》《山海经》《搜神记选》《汉乐府诗选》《韩非子选》《论语》《中国志怪小说》《东方智慧：道德经、孙子兵法、易经》等。

高伯译作为兼职译者，翻译对象门类繁多，译本丰富，平均一年超过 1 个译本，他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译出如此繁多的作品呢？与他对古汉语的掌握程度、翻译经验进阶程度息息相关，更与他对翻译理论展开的研究有关，即他对一般翻译问题的研究，让他获得了更为系统的翻译方法，助力他对各个类别的文学作品展开翻译，总之，高伯译从理论角度分析中国古典文学西译实践，这就为他的翻译行为提供了理论指导，正是基于对“符号转码”行为的常年浸润以及对于翻译问题的深入纠察，他成为了当代最多产的中国古典文学西语译者。

二、学者意识与副文本

曹明伦（2022, p. 175）指明，“所谓学者意识，就是要像学者那样善于研究，译者必须研究所译原文所涉及的事物，具有翻译什么就研究什么意识。”高伯译就具有学者意识，他重视汉语底本，多选择权威出版社的文言版本；他也具备史识素养，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结合哲学思想分析翻译对象及其著者；他也权衡是否作注？思考如何作注？他还为读者编辑译本的阅读细则、推荐拓展书目。凡此种种构成了译本中篇幅可观的副文本：《中国古典神话》译本 344 页，副文本近 200 页；《孙子兵法》西语译文仅 55 页，副文本则有 97 页。总体而言，大部分高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均带有内容丰富、篇幅可观的副文本，主要由序跋与注释组成，它们对主文本的阅读、传播与接受产生影响。

（一）学者素养与译本序跋

译者首先是读者，高伯译也不例外，他对翻译对象的把握首先也是感性的阅读体验，其次才是理性的学术化阐释。所以，序跋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为译语读者提供阅读建议。高氏认为，《孙子兵法》是一系列“微型格言”。（García-Noblejas, 2022, p. 12）因此，不要期待它同其他书一样结构完整、线索明晰。这些格言偶然产生、偶然消失，如同“持续两秒的闪电”。（García-Noblejas, 2022, p.

12) 高伯译大致将读者区分为普通读者与专业读者, 分别提供不同阅读建议, 例如, 倡议普通读者去志怪故事中“享受惊喜、经历恐惧。”(García-Noblejas, 2002, p. 32) 对专业读者如是道, “考虑到部分读者希望进一步了解《公孙龙子》的阐释与翻译, 译本末尾我们添加了一个精选的参考书目, 在这些我们认为有用的所有书目中, 胡适的最为清晰、深刻。”(Yao, García-Noblejas, 2001, pp. 62-63) 推荐书目体现了高氏的学术能力, 也为译著增加了学术含金量。

观照序跋中高伯译对翻译对象的阐释, 可见他惯从多个层面去把握, 善从宏观历史框架下勾勒翻译对象产生年代的文化语境: 融合适量具体史实, 借助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其时的文艺思潮, 旁征博引古今中外学者的观点。尤其擅长从社会学视角分析作品涉及到的社会群体的生活状态, 在《中国古代民诗》的前言就分析了农民的耕战生活状态: 生产活动、军役劳役、信仰与祭祀。其实, 了解中国古代各个群体的生活状态是中国古典文学被翻译成西班牙语的重要动机, 高伯译也是如此, 除了先秦散文, 他选择的传奇、志怪、小说、民诗均注重反映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

如同西语国家的大部分汉学家, 高伯译也在译著中标明汉语底本, 若是选集, 还具体到每一篇的源头, 《窦玉妻——中国唐宋故事选》共 31 则故事, 附录中标明了每则故事的底本, 高氏选择的大部分底本均为文言文版本, 而非经历过翻译的白话文本, 这也体现了他“求真”的学者意识。

此外, 高伯译还论述底本选择的原因, 例如, 在选择《老残游记》汉语底本时, 他放弃了续集, 即在西方影响较大的林语堂《英译老残游记第二集及其他选译》, 而仅采用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二十回《老残游记》, 原因有三: 一是刘鹗生前从未出版过续集; 二是林语堂所译的续集仅六回, 和二十回相比, 数量太少, 不足以称为“第二集”; 三是林语堂的六回不全, 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 续集遗稿有九回。

对底本的选择体现了高伯译的底本意识、学术能力。实践中, 译者身处西班牙时, 汉语底本的获取并不容易, 多依靠朋友从北京寄送, 这是汉学家西译典籍遭遇的实际困难之一。不过,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战略布局, 为汉学家提供的平台与资源愈发丰富, 位于青岛的世界汉学中心就于 2023 年邀请高伯译等多位汉学家入驻, 开展学术, 高伯译在此期间完成了《中国志怪小说》的大部分翻译工作。

(二) 学者意识与注释

曹明伦(2022, p. 176)认为, “有些青年译者一见人名就加注, 以为这是一种学术化的体现, 但很多注释都无助于读者理解和欣赏译文, 反而影响译文的流畅, 妨碍读者的阅读。所以, 对原文提及的历史人物(包括史实)加注与否, 也体现了译者是否真正具有学者意识。”换言之, 并非“加注”或者“能加注”“多加注”就体现译者的学术能力, 而是综合考量文本类型、文本自足程度、阅读体验、文本审美价值传达等因素, 进而谨慎判断是否作注? 如何作注? 这才是译者应该具备的学者意识, 如此注释方能有效支撑主文本, 吸引更多读者。

高伯译就具备这种学者意识, 纵观他的翻译作品, 可见他对注释所作的多重思考与多样践行。可以这样说, 一开始他的翻译实践, 高伯译就对是否作注? 如何作注? 有过深层次的思考。

《山海经》多名物, 若逐一注解, 注释篇幅将轻易地超过译文篇幅。然而, 2000 年出版的高译本, 篇幅近 300 页, 脚注仅 81 条。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答案是采用了成体系的名物注解方式: 斜体

表示后文有详尽描述；“*”号表示此名物已被考证出来且有对应的现代名物；汉语拼音加书名号表示文后附录有具体解释；西班牙语加书名号表示名物的核心意义，例如，将“鲑鱼”译为“《pezmoluscos》”（Yao, García-Noblejas, 2000, p. 45），即“软体鱼”，能让读者直接明白名物内涵，不用查询附录，便可继续阅读。

为此，高伯译还提供两种读法：一是但凡遭遇名物，便查询意义，他称此法比较“科学”；二是完全不理睬各种特殊的注释符号，对名物“不求甚解”，他称此法比较“神话”，可见高伯译对译本的“知识性”与“可读性”的考量。

高伯译对注释的思考也体现在翻译批评中，他曾撰文《20 世纪的中西译者：黄玛赛》（*La traducción del chino al español en el siglo XX: Marcela de Juan*, 2010），对黄译《中国诗歌再编》（*Segunda antología de la poesía china*, 2007）的注释有详细评论。此集选译中国诗歌 192 首，仅 12 条注释，篇幅不到一页。高氏认为，黄译诗歌“不见任何缺失，能够完美理解”¹。具体而言，“黄玛赛并不试图显示她的博学，也不尝试践行研究，亦不为读者提供诗歌产生语境的一些知识、或者其他不属于诗歌、而属于文学社会学领域的知识。”²

对于诗歌注释，高伯译不仅有思考，也有实践，2008 年的《中国古代民诗》主要选自《诗经》与汉乐府，共 140 首诗歌，尾注 56 页，诗歌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都有所本。也就是说，此阶段的诗歌翻译，高伯译较为注重为读者提供“知识”。后来，高伯译再译了《诗经》（2013）与《汉乐府诗选》（2021），前者 305 首诗歌，仅 95 条极为简短的注释，篇幅不足两页；后者 54 首诗歌，只用 15 条注释。

在 2013 版西译《诗经》的前言中，高伯译言道，“深知此书不为专家，我们将可以添加的成千上万条注释减到极少，只选择我们认为对于读者理解文本意义绝对必不可少的注释，以尽最大可能减少对阅读过程的打断。”（García-Noblejas, 2013, p. 41）这个说明极好地呼应了他对黄玛赛的评价。注释数量显著减少证明了高伯译越来越看重译诗的自足性，注重传递翻译对象的文学内涵、审美价值，希望读者去感知、去经历、去享受。

值得注意的是，若纵向地观照高伯译的翻译之路，可见他并非单向度地减少注释，比如，1998 版《韩非子》仅 28 条注释，2023 年修订本却增加至 155 条。原因是作为现代汉学家，高伯译也致力于突破传教士汉学家“寻求中西文化对应概念”的翻译动机，力图将最为真实的中国哲学作品传递给译语读者，希望读者能够通过他提供的知识深刻地理解这些“中国智慧”。

综上，对于加注与否？如何加注？高伯译有过多重思考，翻译实践中采用的注释也有多种方式，这些都体现了他的学者意识，他的这些学者素养助其为译本适宜地注释，利于读者的阅读、感受与思考，有力地补充了主文本。

¹ García-Noblejas, Gabriel. *La traducción del chino al español en el sigloXX: Marcela de Juan* [EB/OL]. [2024-10-31]. <http://cvc.cervantes.es/obref/china/marcela.htm>.

² Ibid.

三、翻译批评与翻译策略

目前,就中国古典文学西译研究而言,国内外学者较多地集中在梳理某一特定对象的西译史或者对译家展开研究,在译家研究的框架下涉猎部分翻译案例。翻译批评较少,少量书评也多止于简述翻译对象、译者,极少对翻译策略、译文质量展开批评,高伯译却是一个例外。

2010年前后,高伯译连续发表了7篇翻译批评,其中4篇为译家批评:高母羨(Juan Cobo, 1547-1592)、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 1618-1686)、杜善牧(Carmelo Elorduy, 1901-1989)与黄玛赛(Marcela de Juan, 1905-1981);另外3篇为译本批评:杜善牧所译《诗经》(*Cancionero chino*, 1984)、毕隐崖所译《道德经》(*El libro del Tao*, 1979)与劳雷亚诺·拉米雷斯(Laureano Ramírez)所译《儒林外史》(*Los mandarines. Historias del bosque de los letrados*, 1991)。

细察7篇翻译批评,高伯译关注翻译动机、策略及译文效果,他认为,高母羨与闵明我的翻译动机在于试图在中国文化中找寻与西方文化对应的概念以及与西方宗教相似的内容,以吸引更多传教士来到中国;而黄玛赛则是首位将翻译转向文学的西班牙汉学家,她不再寻求中西相似之处,转而希望向译语读者传递中国文学之美,这也是高伯译的翻译动机:感知到中国古典文学之美,意欲传递于西语读者。他为《道德经》着迷,认为“它具有语言的美感和精神的高度;充满了光彩夺目且惊人的隐喻;传达着一种在西班牙文化中不曾有的精神。”(García-Noblejas, 2024, p. 23)痴迷于传奇志怪类故事,“我尤其迷恋中国唐宋时期的短篇文言小说,在世界文学作品中,唯一能与之媲美的,只有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García-Noblejas, 2024, pp. 23-24)

观照高伯译对其他译者翻译动机的分析,可以辨析高氏动机。同样,从他对翻译策略以及译文效果的评论,也能见高氏翻译观,对照他的翻译实践,便能厘析他的翻译策略。高伯译赞同黄玛赛翻译文言故事的显化策略与翻译诗歌的“少注解”策略,欣赏毕隐崖、黄玛赛对译出语诗意化程度的不倦追求、拉米雷斯对多种语言风格的综合把握,因为“英雄所见略同”;他不认同杜善牧在翻译《诗经》时因追求术语精准度、语言形式对称而伤害译出语诗意的做法,也不认同他只注重表达《道德经》的哲学思想,而不注重其诗意表达的策略,所以,他反其道而行之。下文仅以2例证明高伯译的翻译批评对其翻译策略的影响。

(一) 对名物翻译“不求甚解”的学者意识

李玉良在《<诗经>翻译探微》中评论《诗经》的名物翻译,以《关雎》为例论述道,“《关雎》中名物虽然为数不多,但它们却规定了一种时代背景、一种文化氛围,也规定了诗篇的基本内容和艺术风格。任何一点改变,都会打破原诗结构的内部和谐,使翻译作品或打上译入语文化的烙印,或换上另一种艺术情调,甚至改变原来的题旨。”其实,这个论断适用于所有包含特定文化词汇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

在高伯译看来,杜善牧就深刻地意识到这些特有词汇的重要性,“杜善牧的译文主要寻求术语的准确度、诗歌行行对应以及两种语言的句法结构的对称,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诗歌的诗意一定受到影响,但很多时候确实如此。”¹观照《诗经》的杜译本(1984)、高译本(2013),确实可见杜善牧

¹ García-Noblejas, Gabriel. La traducción del chino al español en el siglo XX: Carmelo Elorduy [EB/OL].[2024-10-31]. http://cvc.cervantes.es/trujaman/antiores/agosto_12/20082012.htm.

对术语“精益求精”，高伯译“不求甚解”：大多数时候采用更加泛化的词汇来替代特定名物。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杜善牧这种翻译态度属于学者型翻译，因为他彰显了译者对原文本义的探究，体现了译者的学识，这样的译文也属于“厚译文本”“深度翻译”，这样的学者素养体现了译者对“译什么？”的深刻究察。

然而，正如上文曹明伦对“加注”与“学者意识”两者关系的论述，译者的学者意识应该还体现在译者对“如何译？”的深刻思考，即综合翻译活动中的各种因素，作出自己的选择、妥协甚至退让。如高伯译所言，“每个译者都有选择翻译不变体的自由，也就是说，那些他希望在译文中能够保持的原文特征。”（García-Noblejas, 1994, p. 170）这种综合考量后的选择过程与翻译结果都体现译者的学者意识，换言之，若一位译者随意翻译名物，那属于误译；若一位译者对名物“精益求精”，甚至采用阐释性的翻译策略，属于学者型翻译；若一位译者在纵向的翻译实践活动中，经历从“精益求精”到“不求甚解”，那说明后者是他刻意为之，如此策略便是放弃字词对应，选择保持原文整体语义，兼顾译文的流畅度与诗意化程度。高伯译就属于最后这一类译者，纵观他的翻译活动，便可见此种变化过程。

《王风·采葛》中涉及到“葛”“萧”“艾”三种植物，根据《诗经植物图鉴》，分别指“葛藤”“牛尾蒿”与“艾草”，在2008版的《中国古代民诗》中，高伯译将其分别译为“pueraria”（葛属）、“abrotano”（香蒿）、“artemisa”（艾蒿），逐词对应。但在2013版的《诗经》全译本中，他却用“pueraria”一词翻译了“葛”“萧”“艾”三种，不再寻求意象差别，只求将诗情保留。他也不分“麋”“鹿”，用同义的“ciervo”“venado”来表示；将“茅”译为笼统的“hierba”（草）。其实，高氏对名物“不求甚解”，采用语义更为宽泛的词汇来翻译具体名物，是为让读者少一些“术语障碍”，将有限的精力集中在对诗情的感知上。

只要不影响文义理解，高氏甚至还会删减原文的一些信息，《窦玉妻》的开篇为：“进士王胜、盖夷，元和中求荐于同州。其时客多，宾馆颇溢，二人闻郡功曹王翥私第空闲，借其西廊，以俟郡试。”（李复言，1999, p. 191）信息繁多、语义密集，为了避免读者望而却步，他将人名“去名存姓”减为“Wang”“Gai”与“Wang”；删掉“元和中”；将“功曹”泛化为“alto cargo”（高官），将“郡试”翻译为“convocatoria”（招考）。他的这些删减与泛化，保证了译文阅读的流畅度。

（二）对重章叠唱的“加码”再现

毕隐崖与杜善牧均翻译《道德经》，前者注重语言的诗意化，后者更加注重概念的表达，在这一点上，高伯译更加认同毕隐崖的翻译趋向。因此，高伯译注重再现原文的节奏、韵律以及各类修辞。

《诗经》修辞众多，重章叠唱比较特殊，运用得也最多，近一半的诗篇采用此法。“从翻译的可能性上来说，重章叠唱还是比较容易翻译的。至于是不是要在译文中翻译这种修辞形式，那就要看译者是否把诗篇当文学作品来翻译，是否承认这种艺术手法的价值。”（李玉良，2017, p. 102）对此，高伯译是承认的，从2008年、2013年、2019年三次《诗经》西译实践观照，高伯译均再现了原诗的重章叠唱，以《月出》2019版的译文为例观照，为便于分析，将原诗按照重复的结构分为4组：

序号	1	2	3	4
原文	月出皎兮，	佼人僚兮。	舒窈纠兮，	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	佼人嫫兮。	舒忧受兮，	劳心慄兮。
	月出照兮，	佼人燎兮。	舒夭绍兮，	劳心惨兮。
译文	La luna salía brillando	qué hermoso era mi amor	qué suave, qué calmo era	qué pena en mi corazón sin aliento.
	La luna salía luciendo	qué bello era mi amor	qué suave, qué calmo era	qué zozobra en mi corazón sin aliento.
	La luna salía alumbrando	qué perfecto era mi amor	qué suave, qué calmo era	qué dolor en mi corazón sin aliento.

表 1: 《月出》的原文与译文

Table 1: The Original Text and Translation of *Moonrise*

第 1 组高伯译采用的动词不同：“brillar”“lucir”与“alumbrar”，但却巧妙地运用西班牙语副动词，实现押韵叠唱；第 2、4 两组，则与原文对应，句子结构完全相同，只换其中不同的形容词、名词，与汉语原文结构完全相同；第 3 组，高伯译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直接用同一句翻译原文 3 句，可谓实现了“双重”的重章叠唱。此外，第 2、3、4 组诗的首个词语均为“qué”，按照原诗顺序呈现，每段中的第 2、3、4 句也重叠，这其实是西语诗歌常用的一种重复手段“anáfora”，意为每行诗句开始的一个单词或者多个单词的重复。这种重复在原文中并不存在，是高伯译利用西语诗歌修辞的一种创造。

纵观高伯译的翻译实践，可见他日益看重译出语言的节奏，这也是他修订译文的一个重要趋向。《山海经》呈现不同名物时，常有重章叠唱，如“有……焉，其状如……，其名曰……”。2000 版中高伯译并未意识到这种修辞，例如，《南山经》卷一的 3 个“其状如……”分别译为“que es semejante en forma a...”“que es parecido en forma a...”与“que es similar a...”。(Yao, García-Noblejas, 2000, p. 29)《山海经》后于 2021 年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再版，高伯译曾道，“再版过程中，我对初版进行了修订调整，使其更加符合我的最初设想，更能满足普通读者的需要。”(Yao, García-Noblejas, 2024, p. 23)其中一项修订要数对重章叠唱的再现，《南山经》卷一的 3 段“有……焉，其状如……，其名曰……”，高氏一概译为：“Hay allí un tipo de..., llamado (a) ..., que es semejante en forma a...”(Yao, García-Noblejas, 2000, p. 29)，散文中的重章叠唱也被再现。

四、结语

高伯译对翻译理论的探究、对翻译对象的阐释以及对其他译本展开的翻译批评均体现了他的学者素养，这些素养对他的翻译活动、翻译过程、翻译策略均产生了有力的助益；高伯译近 30 年的中国古典文学西译实践印证了学者与译者双重身份的融合路径；他的成长之路也给我们带来了启示。

纵观中国古典文学西班牙语翻译史，翻译主体仍以国外汉学家为主，国内尚无一支稳定的中华典籍西语翻译人才队伍。其实，国内也有不少在大学从教的西班牙语教师，相对充裕的时间以及扎实的语言水平、学者素养让他们如同高伯译一样，具有成为译者的空间与潜质。21 世纪以来，西班牙语人才的基数已经明显增加，若是国内针对西班牙语国家的翻译项目、翻译成果评奖项目进一步提升，高校职称晋升标准体系进一步重视译著，在不久的将来，定能成就一批中华典籍西语翻译家。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Li Cuirong ^{ID} <https://orcid.org/0009-0007-7328-6563>

References

曹明伦 (2022): “论译者的学者意识”, 《中国翻译》(01): 175-179。

[Cao Minglun (2022). “On the Scholar’s Consciousness of the Translator.”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01): 175-179.]

高伯译 (2024): “从《山海经》‘小书迷’到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家——谈一谈我的枕边书和‘译’经路”, 《中国新闻发布》(04): 23-24.

[Gabriel García-Noblejas (2024). “From a ‘Little Bookworm’ of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to a Translator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My Bedside Books and the Path of Translation.” *China News Release* (04): 23-24.]

Gabriel, García-Noblejas (1994): “Problemas culturales en la traducción de textos escritos.” In J.M. Paz Gago (Eds.), *Semiótica y modernidad: actas del V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la Asociación Española de Semiótica*. Servicio de Publicacións de Universidade da Coruña: 163-170.

García-Noblejas, Gabriel (2002). *Las venganzas de los espíritus*. Lengua de Trapo.

García-Noblejas, Gabriel (2013). *Libro de los cantos*. Alianza Editorial.

García-Noblejas, Gabriel (2022). *El arte de la guerra*. Alianza Editorial.

李复言 (1999): 《续玄怪录》。浙江古籍出版社。

[Li Fuyan(1999). *Unreliable strange record*. Zhejiang Guji Press.]

李玉良 (2017): 《<诗经>翻译探微》。商务印书馆。

[Li Yuliang (2017): *Exploring the Translating the Book of Songs*. The Commercial Press.]

Yao Ning, García-Noblejas, Gabriel (2000). *Libro de los Montes y los Mares*. Miraguano.

Yao Ning, García-Noblejas, Gabriel (2001). *Libro del maestro Gongsun Long*. Trotta.